



·新作 述评

《阳明·问道十二境》发行——

在贵州山水中感悟心学的诞生

500多年前，王阳明被贬后谪居贵州。在贵州的近3年时间里，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大悟“心即理”之旨；于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开创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阳明心学。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黔中并逐步形成颇具影响力的“黔中王学”。此后他走出贵州，门徒遍天下，成为留名五百年的一代圣贤，影响了东亚后世的哲学思潮和历史格局。

2020年，根据王阳明在贵州居住期间的生活、悟道以及讲学的行动轨迹，贵州发布了“阳明·问道十二境”文化符号及经典游学路线。《阳明·问道十二境》通过王阳明的足迹，框架性解读“阳明·问道十二境”所涉及贵阳、毕节、黔东南、黔南等地的人文底蕴，建立起对贵州省更多人文目的地的认知，从而达到对贵州省域多彩文化的系统传播。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的《阳明·问道十二境》一书，聚焦贵州人文山水与阳明文化两大IP的结合，是首部将阳明心学与人文地理、省域文旅结合的图书。该书日前在贵阳市阳明祠首发，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董平，东南大学教授陆永胜和著名作家张佳玮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沉浸式体验王阳明的贵州三年

“龙场”，是理解王阳明及其心学体系的关键地标。“龙场悟道”的“龙场”在哪里？“龙场悟道”到底悟了什么？为了回答这些王阳明“粉丝”最关注的问题，《阳明·问道十二境》邀请陈来、董平、杨立华、钱明、顾久等学术名家穿越五百年，体悟那个突破精神困境的王阳明。董平教授在书中提及：“他亲手埋葬了客死龙场的陌生人，其实也埋葬了‘自我’。”“在贵州，他经历了一个完全的心灵蜕变过程”。没有房子住？他搭建茅屋。没有粮食吃？他开荒种地，入山采野菜。甚至于，他还把绝境写成了平生最好的五言古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说，王阳明诗中面对生死绝境，心境是“无怨”两字。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在龙冈山讲学，教了几十个学生，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写下诸多诗文，其中两篇文章入选《古文观止》。他甚至仅用一封书信就助力平息了叛乱……《阳明·问道十二境》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来作序，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专家学者提供关于王阳明学术思想、阳明文化相关权威理论支持，邀请知名阳明文化学者以及多年深耕文化领域的资深作者前往一线实地采访、调研并撰写，以“走近王阳明”“问道十二境”“四海有王门”三大部分，沉浸式体验王阳明的贵州三年。

第一部分，“走近王阳明”，从人物年谱、人物传记、名家学术评价等多重视角，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介绍王阳明这位影响身后五百年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生成就与思想理念。第二部分，“问道十二境”，深入介绍“阳明·问道十二境”涉及到的王阳明人物迹与具体点位。每境分为两篇文章，一篇介绍王阳明在该境的历史事迹、重大事件及思想变迁；另一篇则对该境涉及到的贵州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文风物等内容进行深入阐述。此外，针对这十二境所涉贵阳、毕节、黔东南、黔南等地，本书还配有介绍当地特色景点、节日、风物等文旅亮点的“多彩秘境指南”，从文旅实用性的层面，让读者在了解王阳明与贵州关系的同时，也能深入体验贵州魅力。第三部分，“四海有王门”，围绕王阳明在贵州的“黔中王门”弟子对贵州文教百年影响，以及阳明心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历程等层面，阐述阳明文化对贵州、中国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与价值。

作为国内首次将阳明心学与地理文化结合的图书，本书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阳明·问道十二境”每一境两篇文章的综合解读。

每一境内容的开头，都以书法字体配上王阳明的相关名句，如同打开一章章由王阳明亲自“认证”的贵州“深度游”指南。内容更是从该境的阳明事迹和人文地理特色，综合解读王阳明与贵州的联结。譬如，在第七境“水西论象”的第一篇文章里，你会了解到入选《古文观止》的千古名篇《象祠记》，这是王阳明应水西土司领袖安贵荣邀请，以“良知”为引挥笔写就。安贵荣是开拓了“龙场九驿”的奢香夫人的八代孙，当年王阳明“龙场悟道”便少不了安贵荣的帮助。第二篇文章接着讲述了王阳明深入“水西”核心地区——今日毕节黔西、大方一带，以及与彝族同胞的友谊。安贵荣的孙子安国亨还在王阳明当年研读易经的玩易窝留下了题刻，记录了王阳明在修文的“龙场悟道”与“龙冈讲学”两大关键时刻。从一座今日黔西的景点象祠，引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同胞的一段段精彩往事，以及奢香夫人开拓贵州黔西北的传奇历程。黔西、大方、修文……一处处贵州人文重



镇的代表景观被生动呈现。

作为一本兼具文化传播与在地视野的图书产品，本书图文并茂。地道风物团队组织摄影师多次赴实地调研拍摄，忠实展现“阳明·问道十二境”的风貌；并辅以专业美观的地图、人物形象、图表等可视化元素，呈现贵州的阳明文化。整部书为读者带来一位可感可知的哲学大家王阳明，与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山地大省贵州。

阳明心学一直活着

王阳明为什么能够在贵州悟道？顾久认为这是贵州与王阳明互相成就的结果。具体原因有三：首先是“仕途的中断”。历史已多次证明看似厄运却能成就伟大的思想家，如果王阳明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将主要精力放在仕途上，也许永远不会有悟道的王阳明；其次是“长期的孤寂”。在贵州，王阳明有足够的的时间和空间在孤寂中对生命彻底地思考；再次是“良知的对比”。在贵州，王阳明身边的老百姓看似没什么文化，语言不通，大字不识，跟孔孟之道也不相关，但是他们本着“良知的冲动”，给王阳明提供了很多帮助。庙堂上诸君与身边普通百姓的“良知冲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悟道后的王阳明先在修文龙冈书院开讲，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开启传奇的“传道之路”。在《与贵阳书院诸生书》中，王阳明列举了23位跟随他学习的学生，留下了“黔中王门”。他的学生及再传学生在贵州继续建立书院，影响日益深远。这些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共同推动了贵州在明清之际“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科举成绩。顾久表示，王阳明在贵州的岁月，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发展，这些影响绵延至今，在今天火遍全网的“村BA”“村超”里也能够找到阳明心学的影子。

“我觉得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些影响，王阳明可能就是个没有灵魂的骨架子。实际上阳明心学一直活着，一直保有看有生命力。”顾久说。

“阳明先生作为一个人，他早就作古了。但是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精神、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样态、作为人生的一种活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从其所任职的浙大与贵州的关联切入，观照阳明心学所蕴藏的力量。他说，抗战时期文化西迁，浙江大学“文军长征”赴黔继续办学。在艰苦的条件下，贵州在物质和精神上养育了浙大，精神即指阳

明先生教导的“求是”二字，阳明说：“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董平说，阳明心学事实上便代表着中国文化数千年文明传承的一种汇聚、一种积淀，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其内在价值的彰显。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王阳明被贬谪来到贵州，贵州龙场成了阳明心学诞生的特定场所。“阳明先生之所以能够悟道，就因为他始终坚持他的完善人格理想，追求心体的光明与行为展开的同一性。”他说，阳明先生的“此心光明”，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在阳明先生身上的体现，它将支撑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绽放出生命原本应有的华彩。

当下数字技术发展势头迅猛，从前期的文生图模型，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再到今天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的模型。在媒体传播手段如此丰富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阳明·问道十二境》这部原创图书的意义？阳明心学如何融入当代生活？陆永胜教授以心学社会化的视角，来检视阳明学的转化应用及其路径选择。

陆教授认为，广义的心学社会化呈现为四个具体维度：心学道统化、心学学术化、心学政治化和心学世俗化。《阳明·问道十二境》原创图书的发布，就属于学术化的方面。因此，我们思考心学普及传播时，可以在明代找到大量的思想资源来为今天的心学转化应用路径建构做理论论证。这就是今天图书发布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心学社会化的四重维度分别对应了阳明学的四重形态，即思想形态、学术形态、意识形态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形态，从而指向思想世界、历史世界、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上，《阳明·问道十二境》原创图书的发布就不仅仅是一个行为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意义事件。

“在世界阳明学的视域下，我们今天所讲的文明新形态的建构、阳明学以及阳明学的诸多重要理念，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因素成分参与其中的。阳明学的传承创新，自然就包含着阳明文化新的知识体系建构，即其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陆教授说，“从阳明文化的传统来讲，阳明学的世俗化在根本上是阳明心学的民间教化问题，属于社会德育领域，其目标是要达到一般人的心学化生存状态的建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亦是如此。如果不能推进这个目标实现，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可能都只是一个技术性路线而已，而未必能达到真正的经世价值。”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 文 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 / 图

·新作 推介

《纸短情长》：

讲述中国笺纸的艺术故事

中国古人有“格物致知”之说，在“格物”的逻辑下，许多先人以“物”为中心，孜孜不倦地探求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找到“物”自身的能量。中国笺纸便是其中之“物”，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和文物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值得现代人慢慢品味。北京画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楠新作《纸短情长》，通过大量精美的笺纸图像资料，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可赏、可品、可观的艺术世界。

“笺”，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述，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纸发明以后，文人常把精美的小幅纸张，供题诗、写信用的叫作纸笺、信笺。如果把“笺”和“纸”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加工纸，取名为花笺、诗笺等。每一枚笺纸，堪称一幅微型国画，或是钟鼎彝器的拓片，或清新淡雅，或古朴凝重。其可在方寸之内，集诗、书、画、印于一体，让人在阅读诗词或书信的同时，得到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因而文人雅士对笺纸十分喜爱，他们将收藏的笺纸归类成册成为“笺谱”。

作者有一个判断：笺纸的色彩、纹饰，大致经历了一段由素转彩、由简入繁的发展过程。“由素转彩”的染色笺纸，最早出现在何时尚无定论，但最有名的一定是唐代的“薛涛笺”。

女诗人薛涛用芙蓉花汁制成带有花香的诗笺，并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以诗笺唱和，并流传下一个个“彩笺传情”的佳话，“薛涛笺”也就成为最早的私人定制信笺。宋代笺纸名目繁多，利用雕版技术在纸上压印凹凸

纹饰，称为“研花”技术。“研花”技术应用在笺纸领域，便是“研花”笺纸。到了明代，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的中国木版水印艺术发展到高峰期，尤其是万历年间，木版水印笺纸开始流行，可谓美妙绝伦。文人雅士爱笺，将所藏笺纸归类成册，制作成笺谱，以备流传于世。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堪称我国古代拱花木刻彩印笺谱之首，是我国已知现存最早的笺谱；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胡正言刻成的《十竹斋笺谱》则代表了明代笺纸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采用了短版、拱花等多种印制方法。郑振铎先生认为其“精工富丽，各具众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清中期，江南一带出现了以当时的知名画家作品为图案的笺纸；清末，一批文人亲自参与到笺纸的制作中，绘制成山水题材的笺纸，从此开启了文人画笺之先河。

笺纸的最后一个高峰期是民国初期，姚茫父、陈师曾、张大千、齐白石等一大批大画家涉足笺纸，文人画笺迎来新的高峰。从此以后，笺纸便成为将诗、书、画、印汇聚一堂的艺术品。

随着现代西方书写技术的传入，笺纸慢慢失去了当初的实用功能，成为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很少有人舍得使用。收集笺纸装裱成为笺谱，既可供文房清玩、欣赏，又是研究借鉴的艺术史料。书中介绍了最著名的“收笺成谱”往事，即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他们收集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松华斋、静文斋、宝晋斋、上海朵

云轩、九华堂等所藏的珍贵笺纸，精选其中的331幅古今名人画笺，于1933年木刻精印100部分送友人，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该谱宣纸线装，色彩古雅，兼具雕刻、印刷、图案三绝，收录了林纾的山水笺、陈师曾的诗笺、戴伯和的鹤笺、李柏霖的花卉笺、王振声的动物笺、姚茫父的《萝轩变古笺谱》、西域的古迹笺、齐白石的人物笺、吴待秋的花笺、陈半丁的花卉笺、清末女画家缪素筠的花鸟笺等，图案内容丰富，珍贵异常，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这一传统的艺术资料，堪称“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丰碑”。

可见，在一张张小小的笺纸上，可以窥见文人趣味的转变、绘画风格的变迁。笺纸正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今由于书写方式的改变，人们已很少提笔写字，交流信息也多以电子的方式呈现，但是不少珍贵的书信、信笺被保留下来，成为文化和历史的见证。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 文 / 图



《应物而祥》：

解析明清花鸟画里的吉祥寓意

中国绘画有三大科目：山水、人物、花鸟。花鸟画下，又有走兽、花卉、鸟类、水族、蔬果等分科。细观从古至今的花鸟画，大致有两类题材：一类是烟火题材，如蔬果中有西瓜、南瓜、白菜、芋头、马蹄之类，再如白石老人笔下的虾；一类是祥瑞题材，如“柿子”代表“事事如意”；葫芦寓意“福禄”；九只鹌鹑在一起，常常有“久安”的隐喻；“猫”和“蝴蝶”同人画，便是“耄耋”，是祝寿的题材……这类花鸟吉祥画，简直是从吉祥话中而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先生新出版的《应物而祥》一书，即从明清花鸟画入手，解析其中的吉祥寓意和文化源流。

中国花鸟画的滥觞由来已久。从史前时代的花鸟鱼虫图案，到秦汉晋唐时期的壁画、帛画等，都可见到花鸟画的雏形。早期的花鸟画，多为记事、装饰之需。唐宋年间，花鸟画则兼具寓兴的功能，画家笔下的花卉、鸟兽、草木，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到了明清时期，花鸟画中具有祥瑞寓意的题材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寓兴的范围与社会功能均超越了既往时代。作者认为，传统花鸟画被赋予祥瑞之意，有三种情形：一因谐音而得吉祥之意，如柏树、柿子和如意在一起，便有“事事如意”之寓；二是传统文化语境的赋予，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喻指长寿；三是拟人化，如辛夷花被视为“素色幽香”的君子。本书即围绕其中部分主题展开讨论。

首先是谐音而得吉祥之意的花鸟画。以代表“事事如意”的柿子入画为例，现

存明清期间含“柿”最多的是所谓的“岁朝图”，即为丁庆贺“岁朝”（阴历正月初一）而画的图。毫无疑问，“岁朝图”的生成与传播，是传统新春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的是民众所共同祈求的福祉与祥瑞。

而在“岁朝图”诸多花果中，“柿子”因谐音而自然而然地受到画家的追捧。无论是康、乾时期以宫廷为主体的官方受画人群体，还是嘉道、光宣时期以上海、扬州、广州为主体的民间受画人群体，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诉求与愿景都是相通的。而在画法上，柿子因特有的生物属性，在画中大多以朱砂或赭石绘就，光彩鲜艳，引人注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由此不难看出，与阳春白雪的文人画最大的不同，此类“岁朝图”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是明清时期文人画系统之外的另类，也是商业文明发达与民众精神场域的表现。

其次是传统文化语境的赋能。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长寿”之意的菖蒲为例，蒲本身具有延年益寿的食用功能。在长寿之外，菖蒲更被赋予清新、脱俗、仙灵的意思。尤其到了明代，市井文化兴起，文人画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世俗化的审美情趣与文人逸趣交互并存，使得菖蒲这种兼具文人逸趣与世俗审美的“灵草”成为文人笔下常见的绘画题材。可以说，明代文人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图画中，都比以往任何时期表现出对菖蒲的钟爱。很显然，这是和当时的文化语境分不开的。值得关注的是，在绘制菖蒲图画的诸家中，以活跃于吴门地区的

画家为主。明代的吴门地区，正是中国经济、艺术市场最为繁荣的地区，由此足见菖蒲在这一地区的画家作品中频繁出现并非偶然。

再次是拟人化的结果，常见的如梅、兰、竹、菊一般称作“四君子”；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还有“跃鲤”指“跳龙门”，“祝福高中举子或高升。其中，“四君子”的说法最早始于明代黄凤池辑录的《梅竹兰菊四谱》，梅是“探波傲雪，高洁志士”，兰为“深谷幽香，世上贤达”，竹指“清雅澹泊，谦逊君子”，菊是“凌霜飘逸，世外隐士”。

总而言之，明清花鸟画中，祥瑞题材蔚为大观，它们是艺术市场的宠儿，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之下，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缩影。而书中所选各类绘画，都是以传世之作为中心或详其源流或析其画风或讨论其鉴藏或探究四谱史意义，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画的精神内核和趣味所在。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 文 / 图

